

战时劳工诉讼被受理，点亮幸存者希望

梁晨 报道 来源：环球时报 发布时间：2014年3月23日 19:18:01

From English: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50227.shtml>



2010年8月14日，在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的广场上人们放置了**6,830**双布鞋，向在日本牺牲的中国强制劳工受害者致以崇高的敬意。照片：**CFP**

张时杰，今年88岁，在二战期间，他和另外37名中国人被强制免费为两家日本企业工作，而今他儿子**张阳**告诉他北京的一所法院终于受理了关于此案件的诉讼，他表示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并说道：“终于有点盼头了。”

与其他中国强制劳工一样，**张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当年把他当奴隶使唤的日本企业对他进行赔偿。然而虽然每想到此事，心中总是无限悲痛，但是由于涉案企业声名显赫，迄今为止，这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次有法院受理此类案件。

张爷爷告诉环球时报的记者：“他们把我们当牲畜一样对待。我们提出诉讼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正义。”

外交部关于日本的官方文件显示，从1943年四月到1945年五月，日本军队抓捕并强制了**38,953**名11-78岁的中国人为**35**家公司在**135**处地方工作。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这次受理的案件涉及到两家日本企业，它们分别是三菱材料株式会社和日本焦炭和工程公司（前三井矿业）。据控告，这两家公司当时拥有**9,415**名中国工人，其中**1,745**名死于日本。

根据起诉书要求，两名幸存者以及**35**名强制劳工亲属要求对每位工人进行**100**万元(\$160,600)的赔偿，并要求对方公司在中国及日本的报纸上书面道歉。

康健是一名北京的律师，他在该案件的诉讼中伸出了援手，他表示：“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曾经的血泪和伤害不能被抹去。”**康律师**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找寻和拜访强制劳工受害者，收集证据，并在中国和日本提起诉讼。



2月26日，强制劳工受害者家属前往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日本企业提起诉讼，试图要求赔偿以及向受害者致歉。照片：IC

不屈不挠，坚定不移

过去的数十年我们都可以在书中读到类似的案件，但是日本的法院总是会拒绝受理此类案件。[康律师](#)如是说：“我们从来都未曾放弃过要求赔偿。”

“问题是日本的法院认为在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之时，中国政府便已经放弃了提起此类诉讼的权力，一些地方法院甚至拒绝受理此类案件。”

2001年7月，东京管辖范围内的某法院裁决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向已故强制劳工[刘连仁](#)的亲属赔偿2000万日元(\$195,560)，但是该裁决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

[康律师](#)和受害人以及受害人后代共同向日本法院提出超过15次诉讼，但是无一例外均被驳回。

分析者称日本政府拒绝这些上诉的原因在于他们试图通过改写曾经的协议条款以逃避责任。

[杨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日本问题的专家，她说：“很显然，日本在试图改变日中联合声明的条款。”

[杨玲](#)指出：尽管根据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内容，中国政府已经被剥夺了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权力，但是针对公民个人并没有此种限制。

在中国法院接受诉讼后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发言，要求日本严肃对待侵略战争期间强制劳工事件。



2011年12月11日，山东博物馆内，一位游客驻足凝望二战强制劳工幸存者的照片。 照片：CFP

被过去折磨

张时杰的儿子张阳告诉我们：“我父亲因为年事已高已经记不清太多事情，但是他说他永远都不回忘记被日本人抓走的那段日子。他还记得当时作为强制劳工的种种，包括时间、地点和方式。”张阳现在与父亲同住照顾父亲。他说他父亲觉得当时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日本人对待他们仿佛对待牲畜一样。

张时杰于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他的童年绝不安宁。1943年，他被日本官兵带走。那时，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卧底，在敌军内部秘密收集有用信息。

张爷爷说，1944年6月10日这个日子将永远刻在他的脑海中。那一天，他和约60名其他中国人被拳打脚踢并被胁迫上了一辆卡车。就是从那儿，他们被运到了河北衡水的某监狱。在狱中，张爷爷和另外17个人共同住在仅10平米的空间内。为了不让他们逃走，日本人在他们脖子上安装了铁圈，并用铁链将他们锁在一起。

在衡水监狱呆了10天之后，张爷爷和其他90名强制劳工被送到衡水火车站，最终被送达塘沽集中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迫在密不透风的火车车厢中停留长达14小时，当时正值酷暑，而日本人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食物和水。

张爷爷和其他强制劳工从塘沽集中营上船到达日本。崔广庭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当时也从塘沽离开中国，1944年 he 被抓去给日本三菱做劳工。

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正在抵挡日本入侵，而崔是中国政府做通讯员。五月，他回到家乡后身份暴露，被日本官兵抓捕入狱。

1944年7月7日，张和崔等160人从集中营出发，被迫上了一艘前往日本的船。他们所乘坐的火车原本是运煤的，他们和煤矿一起挤在狭小的车厢。整个行程13天期间，他们不可以离开火车车厢一步。

张清晰地记得有一个来自河北的老乡因为担心其家人而纵身跳入了大海之中。

康律师说，真正的折磨从他们抵达日本的那一刻开始。他告诉环球时报：“日本人扒光了他们的衣服，用鞭子抽打他们，将他们赤身裸体的赶进黑屋子。然后日本人冲着他们喷洒消毒剂，甚至直接对着脸部喷洒。”

“他们每天需要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一天只有一餐，还是发霉的馒头。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在工作期间不允许喝水。如果他们因为太饿从垃圾堆捡腐烂的树叶或食物充饥的话，会被守卫打得很惨。”

康律师还补充说，有些时候，他们不得不跟老鼠抢吃的。

他们抵达日本的两天后，张被送到矿井工作。日本守卫还不允许他们以真名相互称呼，只允许使用数字代号，张时杰的代号是 7744，这个数字他也永远不会忘记。

每天早晨 5 点，日本人就集合所有强制劳工，将他们赶到矿井中开始工作。每天他们有五个馒头，3 个做早餐，2 个做午餐。但是，在头几天，他们的食物全都被大老鼠给吃了。

康律师说他们一休息就会挨打，忘了数字编号也会挨打，甚至不说日语也会挨打。每天超过 10 小时的工作时间，吃得又十分糟糕，导致他们身患各种疾病，有胃病、肺病和皮肤病，等等。康告诉我们：“他们在经受过那样的折磨时候没有谁还能是健康的。”

张被诊断有严重的胃病，但是真正严重的并非是身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创伤。

康律师告诉环球时报的记者：“即使到现在，很多受害者谈到这段在日本做强制劳工的经历还是会突然提高嗓音或者激动不已。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住心中的怒火。他们心中有恨。”

尾声

张时杰回忆那时的经历的时候，面部因愤怒而扭曲。由于日本法院不断拒绝受理此类案件，在坚持不懈寻求正义的过程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无尽的沮丧。

近几年，在日本侨民和一些当地 NGO 的资助下，康律师带领一批幸存者在日本不断提起诉讼。

他们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幸存者年事已高，身体虚弱，需要特殊照顾。有时他们因为身体欠佳无法提供跟案件相关的细节信息。因为他们不会说日语，这些幸存者在与被告律师对质的时候除了绝望就是绝望。

很多幸存者后来也离开了人世。康律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 1996 年-2000 年找寻日本强制劳工受害者的时候，我们共找到了 200 名幸存者。但是事到如今，只有 2 名幸存者还活在人世。”

康律师说，在日本法院均不愿受理此类案件的情况下，中国法院受理此案件对于受害者来说十分振奋人心。

几家日本媒体机构对此表示担忧，他们担心接下来还会有类似的诉讼，使得本来就不乐观的两国关系更加岌岌可危。